

先驱者的历史功绩与历史评价

梁 柱

今天，我们以学术活动纪念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严复诞辰 150 周年，这是对一代哲人的最好纪念。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有的虽能轰动一时，却又很快烟消云散；有的虽有所贡献，但难以恒久影响后世；有的则如高山流水，穿行在历史长河之中。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无疑属于后者。他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独特贡献和留下的思想财富，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

—

对于严复的历史地位的众多评价中，毛泽东独具慧眼。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这里，他把严复这位思想家，同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三大政治人物相提并论，可见在毛泽东的评价中，严复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这对于我们解读严复、研究严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他适应了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以炽热的爱国激情，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民主启蒙的最初倡导者，他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

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感天地泣鬼神，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注定了他们演的是一出悲剧。这时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也终因腐朽的社会制度使之破灭。当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行进了半个世纪，但是许多人对国家已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仍茫然无知，在经受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的痛苦之后，仍然习惯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改变这种麻木状态，救亡和自强都是无从谈起的。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 30 年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这次战败，是一个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还被迫订立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带给中国心灵上的创痛，对沉睡的国人的惊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严复给吴汝纶的信中所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认为：“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应当说，甲午战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

从上述历史背景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是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这是一次更具近代意义的政治变革运动。它所表现的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这两个鲜明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主思潮的传播。在这场变革浪潮中，严复以他包括“西学”译介在内的学术活动和维新思路，使他在维新营垒中别树一帜：着重从民主启蒙入手挽救危局。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讲，严复的工作更具有影响的力度和深度。

严复成为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不是偶然的。他旧学深沉，又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新式教育，特别是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他在欧洲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术思想，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尤为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比较扎实的西学基础，为日后在中国传播西学、倡导民主思想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严复回国后，以他的才学而论，可说是一个怀才不遇、失意宦海的书生。他曾寄厚望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科举考场的失意，虽曾使他一度彷徨，但难以泯灭其强国富民之矢志。他受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去，著书立说，要求变革救亡，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真正转折。在他后来给梁启超信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甲午春半，正当东事举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直布《直报》。”^①抒发了他奋起救亡的爱国情怀。

从 1895 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中国两千

多年来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罗网，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公开表示：时局一至如此，我宁愿背负发狂之名，也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

“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②在这里，他对造成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思考，认定是“其教化学术非也”。很显然，他是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固有的以六经五子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已不合时代的需要，是造成国民文化思想和心理素质落伍的根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家的根本主张。

在严复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主张之所以未获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造成的国民素质的低下，以至“淮橘为枳”。他说：“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之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究其原因：“是故苟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③他认为，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治本之术，在于开发民力、民智、民德。他所谓的“鼓民力”，即指要增强国民的体魄。为此，首要的是废弃那些摧残国民精神和健康的封建礼教、陈规陋俗。“故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心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④他把这看作是言治的当务之急。所谓“开民智”，他明确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⑤他历数八股取士制所产生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严重危害，力主废除，实行注重科学的新式教育。至于“新民德”，严复认为要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来打破封建纲常思想和等级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

诚然，严复所主张的鼓民心、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逐渐演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固本功夫，才能使中华民族因自身素质全面提高而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得以“与天争胜”。这种认识，使他不但不赞成以激进的革命方式来变更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也有所保留。这固然是他的一个弱点，但如果换个角度，从思想启蒙方面看，严复的思想学术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其一，从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来看，思想启蒙是政治革命的先行和必

不可少的一课，如果没有深入的思想启蒙，政治革命是难以胜利或即使胜利也难以巩固。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证明。在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前进的主旋律的情势下，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举起思想启蒙的旗帜，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攻击封建专制及其思想体系，赋予救亡运动以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惟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虽然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取向。所以，严复的民主启蒙工作，为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其二，从严复的思想启蒙影响的深度来看，开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保守观点，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更多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世界。尽管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人们仍习惯于承袭陈旧的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特别是士大夫们仍然死死抱着封建纲常礼教，把任何新思想和变革主张都看作是“犯上作乱”、“名教罪人”。这种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成为严重束缚中国人思想的桎梏。而严复的思想启蒙工作不再把救亡与忠君思想相联系，也不是托古改制那一套，而是直接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思想，鼓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天演论，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具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作用。例如严译天演一说就极大振奋了进步思想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难怪康有为读后表示“钦佩不可言喻”^⑥。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吴玉章曾回忆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忧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⑦毛泽东也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由此可见严复启蒙宣传的历史作用。

在近代中国，历史赋予思想启蒙先驱者的使命，严复出色地完成了。

二

鲁迅曾称赞严复“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⑧。这是十分精到而贴切的赞誉。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在理解时代、观察社会和倡言变革途径等方面，他确是一个锐敏通达的思想家。他以自己独到的维新思想和宣传方式发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用著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成为近代中国传播新文化的第一人，开启了一代新风。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

理。这种学习不仅是热烈而虔诚的，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魏源最早提出要向西方学习，但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主要限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则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不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技术，而且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兴银行、办工业、开矿藏，设新闻馆和书信馆，并提出要“准富者请人雇工”，穷者则“宜令其作工以受值”。就是说，他已经把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现实的方案提出来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更进一步主张以“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这表明，当时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且主张要按照西方的经验，来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由此可见，当时向西方学习已进到了制度的层面。而严复则将这种向西方的学习，深入到思想和理论的领域。如前所述，他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只有开发民智，国家才能富强。在他看来，“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即要学习西方的一整套理论，要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来改造中国的国民素质。他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把讲西学以启民智作为自己的一项历史使命，以主要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宣传唯物主义的实验论，宣传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宣传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逻辑学诸领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相当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使“西学东渐”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了系统而明晰的理论内涵，大大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眼光，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和近代革新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严复的译介如同他的著述一样，是为寻找救国真理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作为翻译家，他主张译作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但为了强调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原著又有所取舍和有所再创造，而且对每部译著加了自序和按语，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天演论》一书的大量“按语”中，就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出发，既介绍了赫胥黎原著的基本原理，又引证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对前者，严复着重强调其“保种进化，与天争胜”的自强观点，不赞同他关于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所谓人性本善的观点；对后者，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而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无所作为思想。这种取舍反映了严复引进“西学”的政治目的，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这样，严复在“引进工程”中，注意结合中国实际，

而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同这时已初露端倪的“全盘西化论”的幼稚病，如“唯泰西是效”和“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严复是为救亡自强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的代表。

其次，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深入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提出要认清时势，把握历史演进的规律。

严复以历史的眼光对比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抨击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⑨以这样尖锐的方式，强烈对比了中西文化之差异，他虽表示“未敢遽分其优劣”，但实际上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文化思想，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弱点造成的，而近世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证明这种文化传统已不适合新的时代要求，已成为现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羁绊。他呼吁要认清时势，“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就是说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方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⑩

严复反对一切顽固守旧、抱残守缺的理念。他特别针对清末颇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提出“体用不二”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主张，是洋务派提出来的。比如，1898年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就提出过。他们所谓的“体”，就是指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则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在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西方“船坚炮利”之类的工艺技术，来为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严复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统一体，是不能分开的。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这里虽不免有激烈之词，但从理论上说，严复是正确的；而他所主张的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要全面采取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制度，才能使“民力日奋，民智日开，民德日新”，实现保种自强的目的，作为近代中国寻找救国真

理的阶段性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再者，在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时突出强调“以人持天”，“与天争胜”和群体的意义。

在民族危机深重，国人精神萎靡、思想枷锁重重的情况下，严复以天演一说惊醒国人，反对“任天而治”，坐以待毙的麻木思想，强调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环境，“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这是人“贵于禽兽”的表现。应当说，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对群体的作用是有一定的认识。康有为强调要“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也盛赞泰西“群术之善”。而严复则更强调“能群善群”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从这里可以看到，严复之所以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标本兼治良方的苦心所在。正由于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形同“一盘散沙”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缺乏群体竞争力的状态也造成我们民族在列强面前的劣势地位。在我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开启民智，激励民族凝聚力，鼓吹“与天争胜”、“人定胜天”的精神，有其重要意义。

上举数端，可以窥见严复作为思想启蒙先驱者在启迪民智中的思想光芒。

三

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我们研究和评价严复这样的历史人物，同样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既不苛求于前人，又不为贤者讳，这样有助于认识一个真实的先驱者，使我们从中获得教益。

严复一生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一个时期，作为民主启蒙先驱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而在他的后期，却一改前期倡导西学、痛斥中学的激进观点，主张“尊孔读经”，领衔发起孔教会，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持保留态度，他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活动明显趋向保守。前后对比，判若两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和这种历史现象呢？

有的论者从严复自身的条件分析，认为是由于他的旧学根柢，这种变化是对

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的则认为严复前后期思想“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实则有着一贯性”，后期“是严复中西文化观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些看法虽有一定道理，实不尽然。深厚的旧学根柢确是他晚年转向尊孔读经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决定的因素。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也多是旧学深沉之辈，他们却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出名，且一以贯之。当然，晚年的严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也不乏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问题在于，对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应该看他的思想和活动是不是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不是有助于历史的前进。对后期的严复来说，当历史已经把革命提上日程，历史要求有一场更加猛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没有继续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而是逐渐退隐。这对于曾经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叱咤风云的严复，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现象，重要的是要从历史条件上加以考察。

当我们充分肯定严复及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启蒙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应当说，他们的思想主张还不完善，还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的弱点。这在新思潮传播的初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严复独具特色的思想启蒙工作的历史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他的基本主张是走一条“教育救国”的渐进道路。作为思想启蒙，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一种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却行不通。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主旋律是救亡，但就其历史的要求来说，救亡和启蒙是相互促进的。为救亡需进行启蒙，但离开救亡实际行动的启蒙，是达不到救亡目的的。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有过一次讨论，严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在这里，孙肯定思想家的作用，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委婉批评，似可看作他对渐进的主张持否定态度。所以，当革命运动已成为历史潮流的时候，原来的一些先进分子没有随着历史一起前进，这是历史发展中常有的现象。像梁启超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就以君主立宪的主张，同孙中山的革命派展开一场大论战，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种情形，在当时思想界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固守其改良主义立场使然。

当然，严复所以有前后期的变化，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因严重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1905年，严复二度赴英，这时英伦景象与其留学时大相径庭，他更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尖锐对立及其民主制度的虚伪性，这不能不引起他对原来醉心的西方文明的反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欧洲大地笼罩着世界末日的景象。这种情景震惊了中国思想界。曾经鼓吹过西方民主自由的陈独秀等人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原来讴歌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游历战后欧洲归来，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了，开始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没落的西方文明。严复同样对欧战的结局震惊不已，他的理想王国也被击得粉碎。正如他给熊纯如的信中所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⑩这时他对东西文明作了对比，“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⑪这显然是促使他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要指出，后期的严复虽然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但仍不改其救亡之初衷，继续从事唤醒民族精神的学术活动，爱国情操贯穿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一生。他晚年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从文化意义上说，这对于克服过去对两者评价上的片面性，更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不足，更多地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矿藏，仍然有积极的意义。自然，他这时主张的以“孔子为中国救主”，按照“孔子之教化”回归传统，这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明日黄花，不合时宜。

同样，严复的前期和后期也不是像一条鸿沟那样截然分开的。如他在 1912 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思想已趋向保守，曾表示要将北大“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⑫但在实际上他仍按近代大学的规律办事，在教学内容上主张中西结合，推行外语会话，加强理工科，改造文科，改进财经、商学等科，并择优派遣留学生。经过严复初步的民主主义改革，奠定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基础。

总之，严复这位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杰出代表，无论是他辉煌的前期还是显得黯淡的晚年，都值得后人研究与评说。我们研究前人，是为了继承他们遗下的精神财富，总结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

八闽大地，人杰地灵。八闽儿女长期接受海洋文化的熏陶，面对五洲风云变幻，他们更多地关切国家的命运，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曾哺育出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和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严复。这是福建的光荣和骄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高擎爱国主义的旗帜，秉承先驱者的遗愿，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注释：

王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514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王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53~54 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26 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27 页。

⑤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30 页。

⑥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 1 册，第 110 页。

⑦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⑧《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29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

⑩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50 页。

⑪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第 690 页。

⑫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第 692 页。

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第 605 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先驱

李进修

1840 年以降，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爱国志士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严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先驱。

—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政府遭到空前的惨败而告终。从此以后，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严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许多爱国志士纷纷要求改革现状、发愤图强，挽救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严复在给其长子严璩书中说：“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①他“腐心切齿”，决意同爱国志士一道，走“变今”维新之道路，积极从事维新救亡运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在天津《直报》上撰写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次年他协助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十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西学”，解救民族危机，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在严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最主要的是发表在《直报》上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在这些重要文章中传播了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

正所谓大到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②。有力地鞭挞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权力，揭露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在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③。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工、贾“相生相养之事”，才“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④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⑤。这样可以使“君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汉学与宋学，进行猛烈的抨击。并指出汉学和宋学完全是“无用”、“无实”的货色，“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皆宜且束高阁”^⑥。抨击科举制度是“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⑦。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⑧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倡要救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⑨严复用西方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大大超过了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反封建思想武器，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理论基础。

二

严复除了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从事培养变法人才的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担任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该馆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⑩，培养改革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三日，严复曾亲赴通艺学堂作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讲演，阐述学习西学的方法和途径。由于他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积极培养人才，遂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虽然遭到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恶毒攻击，却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

在百日维新期间，帝党掌握政权。光绪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詹事府詹事王锡

藩直接向光绪推荐严复：“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侯选首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求“量才录用”。^①经王锡蕃的推荐，光绪在乾清宫召见严复，约谈三刻钟，具体内容在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陈宝琛的《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王允皙的《侯官严先生行状》、王遽常的《严几道年谱》、林耀华的《严复社会思想》等书中都曾提及，但以《国闻报》的报道尤为详细：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悉。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手？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报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无甚得意者，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旆。’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闻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②

回寓后，严复将当年正月六日至十四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万言书》加以整理和修订，送光绪御览。《拟上皇帝万言书》的主旨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为：（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此三策中又以“结百姓之心”最为重要。说：“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一心。陛下果采臣议而次第行之，则为旷古之盛节，机关阖开，而数千年之治运转矣，然后因势利导，所谓既变法所宜先者。”^③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万言书》中未提及，但在《吴汝纶答几道书》中，可知其大意。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

险夷，万物尘散，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在《拟上皇帝万言书》发表后二个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欲求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伸国愤”，^⑭以保国保种。严复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积极予以支持和鼓励。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令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而以为有“受弊根苗”^⑮。“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⑯但是，严复加以整理和修饰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面前，慈禧就发动了政变，光绪成了阶下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严复回到了天津。这一突然事变，使他满腔热情寄希望于光绪的“谋国救时之道”，化为泡影。对六君子被杀和光绪被囚表示无限的悲愤，挥笔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和绝诗，抒发自己的心情。

其一曰：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汉，莫遣寸心灰。^⑰

其二曰：

情重身难主，凄凉石季伦，
明珠三百琲，空换坠楼人。^⑱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没有像其他维新派那样，被屠杀、关禁、流放或被迫逃亡，能够安然返回天津，仍然担任天津北师学堂总办。对于其中缘故人们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严复之所以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著文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在如何实现维新变法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还保持相当的距离。严复虽然反复论证“世变”的必然，但不赞成“速变”，主张“渐变”，先从教育开始。康、梁则不然，反对“渐变”，主张“速变”、“全变”，并且强调立即从政治着手。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严复下毒手。

戊戌政变后，严复虽然免受株连，继续在北洋水师学堂仍任总办两年。但这时的情况已与戊戌变法前大不相同，他在政治上逐渐消沉，生活和行动也受到限制和监视。

三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严复受到很大刺激，他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始翻译外国著作，他先后翻译了英国密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论》、英国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英国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英国约翰·穆勒（J·S·Mill）的《群己权界论》、英国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论》、法国孟德斯鸠（C·J·S·Montesquieu）的《法意》、英国约翰·穆勒（J·S·Mill）的《穆勒名学》、英国耶芳斯（W·S·Jenks）的《名学浅说》、卫西琴（A·Westharp）的《中国教育议》、白芝浩（Walt Whitwell）的《格致治平相关论》等11部著作。约有190多万字，按语有几百条，约有19万字，占总数字的十分之一。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群己权界论》、《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8部译著，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为《严复名著丛刊》问世，1981年商务印书馆又对版本加以校勘重印出版。

严复译书重在社会科学。其中，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富强的真谛，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他译《原富》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有名的当属《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文论》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从来不变的，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⑨。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国家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中国将是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天演论》一经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

鲜的食粮，促使人们转变观念，开拓人们眼界。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第一者也，^②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③。梁启超也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鲁迅在回忆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情况时说：“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④

《天演论》是在戊戌变法前夕翻译出版的，它对于转变人们的观念，开启民智，摆脱封建主义束缚，促进维新运动发展，唤起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挥重大作用。正如革命派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⑤

小 结

严复是第一个把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⑥他的译著使窒息已久的中国思想界开阔了眼界，满足了人们渴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迫切需求。这不仅对维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极大影响。总之，严复翻译和介绍的西方经典著作，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他不愧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新文化的先驱，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启蒙思想家。

注释：

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779~780 页。

严复：《辟韩》，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32~36 页。

严复：《辟韩》，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32~36 页。

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11 页。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31~32 页。

⑥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44~45 页。

⑦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2 页。

⑧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1 页。

⑨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49~50 页。

⑩《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⑪王锡蕃：《奏保人才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374~375 页。

⑫段昌同辑：《报纸新闻——征文恭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408 页。

⑬严复：《拟上皇帝书》，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63、65、69~77 页。

⑭康有为：《保国会序》，《知新报》第 85 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三月二十日。

⑮严复：《有如三保》，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82 页。

⑯严复：《保教余义》，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85 页。

⑰严复：《戊戌八月感事》，王栻主编：《严复集》（二），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414 页。

⑱严复：《古意》，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263 页。

⑲《天演论》上卷，导言二广义，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 1986 年 1 月版，第 1327 页。

⑳《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二）第 525 页。

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万有文库本，第 81 页。

㉒鲁迅：《朝花夕拾·琐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9 页。

㉓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 2 期（1905 年）。

㉔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万有文库本，第 81 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